

# 孙中山 1912 年至 1913 年在上海行馆的考释

朱玖琳

《民国档案》2003 年第 3 期

孙中山 1911 年末在上海的 7 日行馆宝昌路 408 号已被发现，但宝昌路 491 号就鲜为人知了，常被误认为与宝昌路 408 号是一回事。然而宝昌路 491 号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它的历史价值绝不亚于宝昌路 408 号。它不仅是宋氏家族继虹口宋宅之后的又一宅邸，更重要的是它是孙中山于 1912 年 4 月至 1913 年 8 月在沪时期的主要寓居地，是“二次革命”的指挥中心。

宝昌路初名西江路，1901 年筑成，1906 年以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P.Brunat）之名命名为宝昌路（Route Paul Brunat），1915 年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将军霞飞（J.J.C.Joffre）之名命名为霞飞路（Avenue Joffre），1943 年改称泰山路，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以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之名命名为林森中路，1950 年为纪念淮海战役更名为淮海中路。

从上海历史地图看，1914 年的宝昌路地域跨度已与今淮海中路相等。<sup>①</sup>宝昌路与霞飞路不存在地域上的差异，而且宝昌路之改名原因很简单，只是为了纪念霞飞将军在 1914 年 9 月成功地指挥马恩河战役解救了法国，法租界遂决定改名。所以宝昌路之更名并不影响它原先的门牌号。上海另外还有一条宝昌路，但属于闸北区，与法租界宝昌路无关，1915 年前的法租界宝昌路仅一条。由此可见，1915 年前的宝昌路 491 号就是 1915 年后的霞飞路 491 号。

霞飞路 491 号早已被确认是宋家在法租界住宅的门牌。1918 年 5 月 3 日，宋嘉树在霞飞路 491 号去世。当时孙中山在广州因护法运动失败而辞去大元帅职，不久回沪，寓居莫利爱路 29 号（今香山路 7

---

<sup>①</sup> 民国 3 年（1914）上海租界图中明确标明宝昌路西端至徐家汇路，徐家汇路即今淮海中路西端华山路。

号)。7月4日他致函长子孙科，告他：“宋子文之住址如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四九一号。彼与孙夫人二人，儿当致函，以吊唁其父可也。”

①

宋嘉树去世不久，宋家便迁往西摩路寓所（今陕西北路369号）。宋氏全家照年代考订者刘复昌认为：霞飞路寓所是宋家1915年至1918年在沪寓所，宋氏全家照1917年即摄于该处。<sup>②</sup>

但目前所发现的史料证明宋家早在1912年就已经在法租界居住了。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在华传教士步惠廉是宋嘉树的美国同学、好友和同事，在上海时期与宋嘉树来往密切，宋蔼龄便由他介绍往他家乡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并带出中国。步惠廉之子詹姆斯·贝克在《我的父亲在中国》一书中记叙了许多宋嘉树与步惠廉之间的来往史实，其中记道：1912年5月，步惠廉受宋嘉树和宋蔼龄（误，宋蔼龄此时已随孙中山赴广东）之邀赴宋家。“这是步自革命以后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俩都在从事政治活动，蔼龄是孙逸仙的秘书，宋是这个广东伟人的知己之一。孙到上海时便住在宋家（已从虹口搬到法租界）。”<sup>③</sup>

同时出版的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所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一书也称：1913年春宋庆龄大学毕业回国[误，宋庆龄大学毕业后并未直接回国，而是去日本与流亡在那里的家人团聚]时，宋家“仍在法国租界区霞飞路[误，1913年时称宝昌路]的一所房子里”<sup>④</sup>。所不同的是埃米莉·哈恩称孙中山挨着宋家在上海安下了家，并非住在宋家。

步惠廉是宋嘉树的密友，埃米莉·哈恩是宋氏三姐妹的密友，两书所述均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两书明确了宝昌路491号宋宅的存在，但对孙中山当时是否居住宋家却各执一词，到底孰是孰非？

①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5页。

② 见刘复昌：《宋氏全家照年代略考》，《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

③ James Burke, "MY FATHER IN CHINA", FARRAR & RINEHART, INC. NEW YORK, TORONTO, 1942.p260

④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宋嘉树是孙中山最早的同志和朋友之一，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就是应宋嘉树的建议而发动的。宋庆龄称：孙中山流亡海外期间，每次秘密回国必然住在宋家<sup>①</sup>。1912年4月至1913年8月孙中山在沪期间，宋嘉树不仅为孙中山提供住宿，而且还积极参与他领导的实业建设活动。所以，宋庆龄在致《宋庆龄选集》日文版翻译者仁木富美子函中说：“我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在1912年参加了革命，帮助孙先生从事财务工作和负责英文信件的答复等等。”<sup>②</sup>宋嘉树长女宋蔼龄也正是在这时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总统职后于4月3日由宁抵沪。当时上海的《民立报》报道：“孙下车后即往哈同花园暂驻。”<sup>③</sup>《申报》则谓：“闻孙君现驻节三马路客利西旅馆”<sup>④</sup>。《时报》称：“闻孙君寓某君家，唐（绍仪）君则寓客利旅馆。”<sup>⑤</sup>《孙中山史实详录》的作者王耿雄在考证孙中山致李晓生函时认定，孙中山由宁抵沪的当晚即投宿宋宅。<sup>⑥</sup>孙中山随从则住三马路（今汉口路）客利旅馆。次日孙中山亦往客店，接待来访者，处理公务。

孙中山来沪后，曾六度从沪上出发往来各地，每次回沪均留宿宝昌路491号宋宅。4月14日，孙中山赴鄂访问后首次返抵上海。《民立报》报道：“孙君与其男女公子宿友人宋君之家，延见宾客则在汇中（今和平饭店南楼）”，随从仍宿三马路客利旅馆。<sup>⑦</sup>报纸未报道宋君的全名，但流亡海外多年的孙中山在上海的同志“实鲜其人，有之亦暂过往者耳。”<sup>⑧</sup>孙中山在上海的宋姓友人能举名者仅宋嘉树而已，孙中山在1912年4月的致李晓生函中也曾称：宋嘉树是隐传革命之

<sup>①</sup> 见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sup>②</sup> 《宋庆龄书信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页。

<sup>③</sup> 《民立报》1912年4月4日。

<sup>④</sup> 《申报》1912年4月4日。

<sup>⑤</sup> 《时报》1912年4月4日。

<sup>⑥</sup> 《孙中山史事详录》作者王耿雄在考证孙中山致李晓生函日期时，据《致李晓生函》内容及《时报》1912年4月4日谓孙中山来沪后“寓某君家”的报道，断定该函书于1912年4月3日而非1912年4月17日，某君即宋嘉树。

<sup>⑦</sup> 《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

<sup>⑧</sup> 《复宗方小太郎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4页。

道的“隐君子”，“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sup>①</sup>再及宋蔼龄已以孙中山秘书的身份于4月6日首次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并陪同孙中山从沪上往来各地，宋蔼龄随孙中山一行返回上海后，宋嘉树完全有可能出面邀请孙中山及其家人留宿宋家。

6月21日，孙中山故乡行后再度返抵上海，到埠时已是午夜。《民立报》报道其“寓沧洲旅馆”。当时，孙中山子女亦跟随来沪，并于6月28日往北美留学。<sup>②</sup>时黄兴辞南京留守职亦至沪，孙中山便在黄兴处见客议事。虽然没有材料证明该阶段孙中山寄宿宋家，但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孙中山并未寄居黄兴处，除抵沪次日晨曾在旅馆接见来人外，也不再见他在旅馆的其他任何活动报道。6月21日至6月28日有长达一周的时间，孙中山不太可能携带家眷尤其是女眷长期逗留旅馆，很有可能孙中山后来依旧住进了宋家。

10月3日，孙中山北上会袁世凯后三度返抵上海。这次他带着夫人卢慕贞，随同来沪的还有在北京陪同孙中山夫妇的温秉忠夫妇。温秉忠是宋嘉树的连襟，温夫人倪秀珍是倪桂珍的妹妹，他们到沪后便同孙中山一起“乘汽车至法界宝昌路四九一号行馆。”<sup>③</sup>次日孙中山“仍寓法界宝昌路四九一号”，并在该宅接见中华民国铁道协会<sup>④</sup>人员，谈全国铁路进行事宜。<sup>⑤</sup>这是报纸对孙中山在宝昌路491号宋宅见客议事的唯一一次报道。

10月31日，孙中山赴赣视察后四度抵沪，“仍寓宝昌路四九一号”。<sup>⑥</sup>

11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并于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A字第36号设立事务所。宋嘉树担任会计，宋蔼龄主持外事。<sup>⑦</sup>以后孙中山大多在该办事所处理公务。

<sup>①</sup> 《致李晓生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2页。

<sup>②</sup> 《民立报》1912年6月18、19日；《致咸马里夫人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86页。

<sup>③</sup> 《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

<sup>④</sup> 由原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于右任等组织，一度解散。后因孙中山提倡铁路，乃重新集会。

<sup>⑤</sup> 《民权报》，1912年10月5日。

<sup>⑥</sup> 《天铎报》，1912年11月2日。

<sup>⑦</sup> 孟天祯著：《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69年版，第145页。

12月12日，孙中山杭州5日行后五度抵沪。《申报》在报道其杭州之行时，仅叙及孙“侨寓上海”<sup>①</sup>，未明寓居的确切地址。但短短5日暂离上海，没有材料证明孙中山回沪后又有别居。

1913年2月，宋嘉树作为孙中山赴日考察一行的正式成员，同孙中山等一起离沪。此次赴日的还有宋蔼龄、倪桂珍及孙夫人卢慕贞。因为已是旧识，所以三人在与孙中山一行暂时分手后一起行动，她们曾一同去温泉圣地疗养，亦曾同车遭遇车祸，后由宋嘉树由福冈赶往东京全权处理。<sup>②</sup>

闻宋教仁在沪遇刺身亡，孙中山一行于3月25日匆匆返抵上海，孙中山当晚即赴黄兴寓所讨论处理“宋案”及发动“二次革命”的问题。“孙中山回沪后，假寓法租界宝昌路四九一号门牌。前日（26日）由法总巡兰维蔼君特派越捕、华捕各一名，在寓所前后日夜轮班梭巡，并于夜间加派包探两名换班查察，妥为保护。”<sup>③</sup>

孙中山在沪领导“二次革命”的同时，也不忘实业建设。他连续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办事处召开4次会议，筹办中日合资的中国兴业公司。宋嘉树作为上海地区的实业家列席历次会议，并以筹办员身份被推举执管公司所有簿据等件。<sup>④</sup>

“二次革命”不久失败，8月2日孙中山等逃亡日本，宋嘉树已偕家人先期离沪亡日。此时，刚刚大学毕业的宋庆龄正在回国的途中，遵父旨，她中途转往日本，途中致函老师哈泽德夫人，叫她按照“东余杭路628号C”虹口宋宅的地址写回信<sup>⑤</sup>。

孙中山在沪这段时间内，当时的报纸对他巡行各地归来后的住址起先仅报道是宋宅但没有明确门牌号，后来报道宝昌路491号时又没有明确说明就是宋宅，甚或直接称是孙中山的行馆。值得注意的是，

---

<sup>①</sup> 《申报》1912年12月6日。

<sup>②</sup> 见[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98页；王耿雄著：《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9页。

<sup>③</sup> 《申报》，1913年3月28日。

<sup>④</sup> 沈云荪：《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兴业公司会议记录》，《团结报》1983年11月12日。

<sup>⑤</sup> 见《宋庆龄书信集》上，第8页。

孙中山也不轻易在宝昌路 491 号会见外人、处理公务。而孙中山在居住宝昌路 408 号时不仅频繁接见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而且还在那里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并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因为宝昌路 491 号是宋家私人住宅，所以孙中山只能“里外有别”。孙中山当时在九江路还有一处不向外界公开的私人办公室，即由宋嘉树负责，宋蔼龄也在那里为孙中山工作。那里戒备森严，宋家的车夫也在那里做保镖，充当第一道门卫。<sup>①</sup>

1914 年 11 月宋家结束流亡生活，回法租界居住。当时宋庆龄曾在给昔日同学的一封信中描述法租界宋宅道：“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我们家里有许多卧室、浴池和盥洗室，将来你一定要到我这儿来看一看。”<sup>②</sup>可是孙中山从日本致宋蔼龄、宋庆龄的函，仍投往虹口宋宅。<sup>③</sup>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宋家一直保留着虹口住宅，并“从这所房子收租税，直到 1937 年日本人占领虹口。”<sup>④</sup>二是因为宝昌路 491 号已被报界作为孙中山行馆而曝光，一向谨慎的宋嘉树也许基于安全考虑，来往信函便以它处作为地址。

虹口宋宅是宋嘉树在沪的第一所住宅，与倪氏亲属住宅建在一起，步惠廉 1896 年曾应邀去过。有一种观点认为宋家早在宋庆龄出生前就已经搬入法租界<sup>⑤</sup>，这是不可能的。1912 年 1 月 12 日宋嘉树致函孙中山，地址还是虹口宋宅。当时孙中山正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政治上处于旺势，因此不存在安全问题。它只能说明宋嘉树此时还未搬入宝昌路 491 号，宝昌路 491 号只能是宋嘉树在当年 2 月至 4 月间搬入的。

1915 年 10 月 25 日，满怀爱国热情和理想的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偷偷逃到日本与孙中山结婚。宋嘉树夫妇紧随其后，企图追

---

<sup>①</sup> James Burke, "MY FATFER IN CHINA", P261.

<sup>②</sup>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 98 页。许多文章将宋庆龄的这一描述误认为是针对虹口宋宅，但虹口并不属于法租界。

<sup>③</sup> 见俞辛焯、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 年 8 月—1916 年 4 月）——日本外务省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sup>④</sup>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 30 页。

<sup>⑤</sup> 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 页。

回宋庆龄，但女儿已与孙中山结婚。气愤至极的宋嘉树回国后就病了，他没有直接回上海，而是去了宋家在青岛的别墅（1931年宋母倪桂珍便在此逝世）。他把宋蔼龄从山西召来，逐渐康复后才回了上海。12月4日，宋蔼龄和丈夫孔祥熙回到太谷，随即有人告诉孔，袁世凯政府正在调查孔和宋家。孔祥熙随即去北京找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两寻未着，他便托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罗伯特·尔·盖利给莫理循写信，解释宋嘉树为什么去日本，说宋家人已恨透了孙中山，而他本人也与革命党人毫无瓜葛。<sup>①</sup>不管孔祥熙此举是否另有隐情，但这封信的内容已足以让孔祥熙和宋家摆脱“与革命党人站在一起的嫌疑”。所以宋家当时无论是在虹口公共租界的住宅或是在法租界的住宅都是安全的。宋嘉树不可能在1915年“为安全考虑，迁入法租界的霞飞路。”

宝昌路491号宋宅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失败，见证了宋嘉树在1912年至1913年间与孙中山风雨同舟的历史。由于宋嘉树生前行事谨慎，不喜张扬，以至它鲜为人知。可惜的是这所历史名宅据说早已荡然无存，也许宝昌路宋宅（也就是后来的霞飞路宋宅）的确已经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宋家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宋嘉树在孙中山危难时刻对他的帮助，是不应该被历史遗忘的。

---

<sup>①</sup> 见（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1895—1920》，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13-516页。